

# 论从周刊

## 正确看待“三大陷阱”

□ 孔繁轲

对于“三大陷阱”，目前社会上有两种代表性观点：一种是相对悲观型，认为中国不能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极有可能陷入某些“陷阱”；另一种是盲目乐观型，认为跨越“陷阱”不是什么问题，没必要大惊小怪。这两种观点都不可取。正确认识并跨越“三大陷阱”，一方面要坚定信心，对国家未来发展保持战略定力；另一方面要高度重视，积极应对风险挑战，有效化解矛盾问题，努力化“危”为“机”，实现成功跨越。

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一种是相对悲观型，认为中国不能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极有可能陷入某些“陷阱”，容易挣扎不出来；另一种是盲目乐观型，认为中国如果保持现在的发展速度，跨越“陷阱”不是什么问题，没必要大惊小怪。这两种观点都不可取。在我看来，正确认识并跨越“三大陷阱”，必须坚持科学的思维方法，进行理性辩证地分析。

——历史地看。首先，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发展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通过发展实现崛起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国真正的大发展肇始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而那些已成功跨越“三大陷阱”的西方国家则经历了几百年的积淀，指望中国在40多年时间走完西方国家几百年走的路，既不现实又不可取。其次，充分认识国际社会上没有哪个大国发展是一帆风顺的，过去所有大国崛起多伴有诸多困境甚至战争。尤其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基础上，未经资本主义的“卡夫卡峡谷”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中国，与某些大国相比，底子薄弱，制度迥异，跨越发展的势头令一些国家产生担忧、质疑和猜测。为此，我们必须对国家未来发展保持战略定力，切不可因一时之挫改变既定方向，更不能因外部掣肘打乱复兴大局。

——唯物地看。面对“三大陷阱”，能否迈出坚实的“一跨”，关键要看我们的态度与毅力。仅就“修昔底德陷阱”而言，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事实也是如此。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大国出于自身利益，片面以为中国崛起“挑战”了它们的霸权，千方百计对我进行围堵、打压，既为中国发展设计了“陷阱”，也给世界和平蒙上了阴影。因此，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拥有长期和平的国际环境符合我国的根本利益，但和平环境不会自然生成，主动惠顾，需要我们在坦然应对挑战的同时积极争取、努力创造。

——辩证地看。“三大陷阱”问题给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风险挑战，而积极应对风险挑战也就获得了发展机遇和空间。以“中等收入陷阱”为例，如果认识到位、把握得当，则可以使一个国家或地区进入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的快车道。这就要求我们，善于把握机遇，采取行之有效的政策策

略，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有效化解矛盾问题，更好地化“危”为“机”。对此，我们有着充分的自信。到2020年“十三五”规划完成之时，我国人均收入将达到12000美元，就能够基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发展地看。“J曲线”理论认为，对于一个处于发展或改革中的社会来说，社会的价值能力以及人们的期望值都在不断提高，但是受某些因素的影响，会造成价值期望和价值能力之间的落差扩大，从而导致人们对政府产生不满。而当社会发展达到一定阶段后，这种状况会逐步好转。所以，对于当前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矛盾问题，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即：随着改革发展的不断深化，诸多矛盾问题会逐步解决，社会也将更加和谐。当然，这种局面的到来不可能“天上掉馅饼”，需要党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共同努力、一一化解。

### 集中精力办好自己事，不断开辟发展新境界

要成功跨越“三大陷阱”，必须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保持战略定力，坚持底线思维，在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征程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行。

牢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为中心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也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征途上，必须始终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充分发挥亿万人民的主动性、创造性。一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最根本的要靠发展，而发展的动力之源，归根到底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二要坚持发展依靠人民。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推进伟大事业、破解发展难题更需要全体人民的团结奋斗。三要坚持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经过多年改革发展，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人民群众的需要呈现多样化

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这就要求既要做大“蛋糕”又要把“蛋糕”分好，努力做到全面共享、共建共享、渐进共享。

始终保持发展的战略定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面对“三大陷阱”的严峻挑战，我们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坚定不移抓改革、促发展。首先，扭住发展不放松。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深刻认识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变化，更加主动地应对各方面风险挑战，集中精力办好自己事情，不断开辟发展的新境界。其次，积极有所作为。着眼营造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在聚精会神搞建设的同时，积极有效地参与国际事务、贡献中国智慧，大幅提高国际话语权、影响力。

切实贯彻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走好新的“长征路”提供了基本遵循，也是成功跨越“三大陷阱”的根本保障。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讲话贯穿的坚定信仰追求、历史担当意识、真挚为民情怀、务实思想作风、科学思想方法，以思想理论的清醒确保政治上的坚定，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突出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在新发展理念引领下，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主动适应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不断深化各领域改革，确保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坚持不懈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中国共产党执政是我国最大的政治优势。能否成功跨越“三大陷阱”，首先要看我们党是否坚强有力。一要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管党相结合。要推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实现从“关键少数”到所有党员全覆盖；把党性修养作为共产党人的“心学”，坚持不懈地强化思想理论武装；将党章作为共产党人的“原教旨”，始终不渝地讲规矩守纪律。二要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要抓铁有痕、踏石留印，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机制环境。三要着力建设过硬队伍。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切实强化“四个意识”，做到知敬畏、明底线、守规矩；严格落实“四讲四有”党员标准，始终恪守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促进改革发展稳定中当标兵、做表率。如此，才能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使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也只有这样，才能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戮力同心，成功跨越“三大陷阱”。

(作者系山东省委讲师团团长)



## 守好四道防线

□ 杜爽

矛盾越尖锐、挑战越严峻，越需要坚持底线思维，牢牢守住各道防线。

“两学一做”基础在学，关键在做。要想成为合格党员尤其是合格领导干部，无论在工作还是日常生活中，都必须坚持底线思维，严格按照法规和制度办事，牢牢守住各道防线。只有这样，才能在深化改革的大潮和实现中国梦的征程中担当重任，减少失误，有所作为。这其中有四道防线，尤其需要严守：

法律法规高压线不能碰。我国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决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法律面前没有特殊公民，党员干部更应当受到国家法律的严格约束。党员干部要牢固树立法治观念和意识，自觉遵纪守法。这既是基本义务，更是对自己最起码的要求。法律防线一旦失守，权力就会失控，行为就会失范，贪欲之门就会被打开。当前，党中央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反腐倡廉，无论是谁，无论职位高低，无论过去功劳有多大，只要做了违反法律的事情，就一定会受到严惩。防止触碰法律“高压线”，首先要学法懂法。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党员干部必须认真学习和熟悉相关法律法规知识。否则，在参与市场经济的活动中就可能因不懂法而出现扯漏和差错。其次，要严格依法办事。党员干部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都要具有法治思维，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开展工作。只有将依法办事作为行为准则，不为名利所累，不被物欲所惑，不为人情所扰，才能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

党纪党规底线不能越。当前，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已经尖锐地摆在了全党面前。为了防止这“四种危险”，十八大以来，党中央连续出台了多项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规章制度，如八项规定和六条禁令等等。这些规定和禁令实际上就是对党员干部从事各项活动和日常工作行为设定的一条条警戒线。能否切实做到不跨界、不越线，落实好这些规定和禁令，对党员干部的党性和品行都是一种考验。如果工作上不遵守纪律，行为上不遵守规矩，生活上不注意小节，表面上说一套，暗地里做一套，就会使党的权威受损，就会降低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光辉形象。党纪严于国法。当前，“两学一做”活动正在常态化和制度化，每一名党员干部都要时刻把改进工作作风、密切党群关系、干群关系视作为头等大事。要使接受纪律规矩约束成为一种习惯，严格要求自己，一种自觉、一种责任、高标准、严要求，身体力行，以身作则，切实把中央的各项规定和要求认真贯彻落实。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要坚持从小事做起，把好事、不该去的地方不去，不该拿的东西不拿，不该交的朋友不交。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因“小”失大，得不偿失。

政策制度红线不能踩。近年来，为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党和政府划定了多条红线，如十八亿亩耕地红线、生态保护红线、生产安全红线等等。每一条红线都是不能任意践踏的禁区 and 雷区。党员干部一定要强化红线意识，时刻在思想上绷紧红线这根弦。头脑中没有红线，就没有敬畏，更谈不上严防死守。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十分艰巨，各种矛盾和困难层出不穷，工作中稍有不慎就可能逾越红线。但矛盾越尖锐，挑战越严峻，越需要在思想上把红线这根弦绷紧。否则，不仅会个人的政治生命带来致命影响，更有可能给党的事业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危害和损失。避免逾越红线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要严格遵守各项政策、规章和制度，提高制度的执行力。因为制度和规章本身就是红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要避免误闯禁区，就必须维护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确保中央政令畅通。决不能出现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现象。无论是思考问题、制定规划、布置任务，时刻都要把制度的规定和要求放在第一位，形成依靠制度用权、办事、管人的科学机制。只有这样，才能把红线在实践中铸得住、守得住、管得住，也才能最大程度地防止和避免工作出现失误。

做人做官道德底线不能破。做人要讲人品，做官要讲官德。党员干部的道德底线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政治道德底线。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是党员干部最基本的政治素养，最起码的政治品格和最根本的政治要求。这不仅是一种立场，也是一种情感，更是一种道德信念。每一位党员干部在入党时都履行过宣誓仪式，信誓旦旦，言犹在耳。如果自己的言行背离了自己的誓言，背离了党章要求，那么这种宣誓就是一种欺骗，就是政治上的不道德。其次是职业道德底线。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最重要的职业道德是勤政和廉政。勤政就要恪尽职守，如果在其位不谋其政，不仅会使人失去为社会服务、实现人生价值的机会，更严重的还会因为官不为民谋而成为发展时机、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影响民生福祉。廉政就是不能以权谋私。当官就不要想发财，想发财就不要当官。如果既想当官又想谋取不义之财，就突破了职业道德的底线，就会出现腐败问题。最后是个人品德底线。人品道德是做人的基础。党员干部由于其身份特殊，品德问题更为重要。能否做到诚实守信、爱国持家、为政以德、清正廉洁，不仅事关个人形象，而且会影响到身边的群众和下属。在为人处世方面，党员干部必须严于律己，树立良好的道德形象。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作者系河南省委党校教授)

□ 责任编辑 马清伟 李 檬

## 新论语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国际关系风云多变，国内形势错综复杂。在新的历史“赶考”中，体现外部忧患的“修昔底德陷阱”、内部挑战的“中等收入陷阱”、政府与群众关系的“塔西佗陷阱”，是我国发展过程中绕不开、躲不过的“坎”，时刻考验着我们党的执政智慧和能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跨越“三大陷阱”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主动回应了国际国内的关切和忧虑，为成功跨越“三大陷阱”、顺利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重要遵循。

### 国家发展壮大到一定阶段后，必然面对的历史课题

“修昔底德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塔西佗陷阱”的概念并非中国原创，这些矛盾困境也并非仅中国需要面对，它们是一个国家在发展壮大到一定阶段后必然面对的历史性课题。

“修昔底德陷阱”源自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意为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为此，战争将变得不可避免。从本质上讲，它针对的是如何解决发展过程中构建良好国际环境的问题。“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由世界银行2006年最早提出，意思是新兴市场国家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3000美元向12000美元跨越过程中，由于矛盾集中呈现，发展战略失误或受外部冲击，导致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深陷泥潭不能自拔。从根本上说，它针对的是如何处理好发展过程中效率和公平，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塔西佗陷阱”得名于古罗马时代历史学家塔西佗，是指当公权力遭遇公信力危机时，无论发表什么言论、颁布什么政策，社会都会给予负面评价。它针对的是在发展过程中怎样巩固执政根基的问题。面对日益凸显的“三大陷阱”，我们党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和判断。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外国际多种场合强调要防止落入“三大陷阱”，有信心跨越“三大陷阱”，向世人宣示了治国理政的应有担当。

### 能否迈出坚实的“一跨”，关键要看我们的态度与毅力

对如何认识、跨越“三大陷阱”，目前社会上

## 当神灵遇上资本

□ 王加华

到前去祭拜。传统中国民间信仰的另一个特点是讲究“唯灵是论”，一个神，只要“灵”，只要能满足“我”某些方面的需要，就会去信奉与祭拜，而不会去计较此神的神格究竟如何。这就导致传统中国民间信仰的神灵体系是无派系化的，不论儒、释还是道，不论佛祖、老君还是孔子，都可以和谐地共处一庙、共居一堂。因此，这种在正统教派看来“大逆不道”、毫无章法之象，在民众眼中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也正因此“唯灵是论”，传统中国民间信仰的神灵体系总是历久常新的，即人们总会根据社会的发展与自身的实际需要而不断创造出新的神灵，或是将某位神灵的“职责范围”因应形势的需要而不断予以扩大。因此，传统中国的神灵信仰总是与人们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个地方的神灵信仰形态也总是与一个地方的自然及社会生态紧密相关的，也就是说社会体系与宗教体系之间是“相互定义”与“相互再生产”的，其背后的逻辑，则在于民众对“圆满”与“平安”的追求。

明白了中国传统神灵信仰的性质与内在逻辑，则河北易县奶妈庙诸神杂处的现象也就不难理解了。我们可以发现，奶妈庙一系列神灵的呈现，其实仍然是在传统神灵信仰的体系与逻辑之内展开进行的，只是因应时代的步伐而稍有改变而已，如车神中所握有的方向盘。为满足实际生活所需，中国古人创造了一个非常庞杂的神灵信仰体系，可谓处处皆有神，如灶神、门神、堂奥神，甚至连厕所都有主管之神。而从“职能”的角度来说，也是万神俱备，如财神(关公、比干、李诡祖等)、生育神(如泰山奶奶、送子娘娘)、学神与考神(文昌、魁星)、医药神(如神农、手大夫)，等等。至于易县奶妈庙中广受热议的、手握方向盘的车神，也是古已有之，且还不止一位，如轩辕黄帝、造父、六龙、奚仲等。古有奚仲造车之说，因此奚仲也就成为中国古代的车神之一，且在今天仍旧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江苏茅山的茅山道院与乾元观、常州的白龙观、上海城隍庙等，即均供奉有车神奚仲。只是与古不同的是，今天的奚仲已不再是造车神，而变为行车安全的保护神，故常有入于此祭拜并进行新车的开光仪式。因此，易县奶妈庙中所出现的各位神灵，其实我们都可以在古代神灵中找到他们的影子，只是将原本身处各地的神挪移到了一



处并根据现实需要作了某些改变而已。而这些神灵的出现，实际上又反映的是当下民众的社会心理需求。比如，今天中国的汽车保有量已达到了两亿辆，与之相伴随的则是几亿人的司机数量，行车安全成为人人关心的话题，于是供奉或再创造一个新的车神也就不足为怪了。至于学神、财神等，实际上也是今天人们高考得中、发家致富等观念的反映。几百万人次的蜂拥而至——虽然其中肯定不乏看热闹与猎奇之人，即是对于的最好说明。总之，河北易县奶妈庙中的诸神杂处，从民间信仰与社会生活的角度来说，其实并没有什么奇特之处。

当然，与传统的民间信仰相比，今天的神灵信仰已发生了很大改变。其中一个重要变化，即是信仰与资本相结合而日益成为一种赚钱的工具。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越来越多的庙宇，尤其是那些位于旅游景区内的庙宇，被私人承包而成为谋取经济利益的“摇钱树”。河北易县奶妈庙，正是此一现象的反映，据说其一个殿一年的承包费即高达150万元。

当前庙宇承包或兴建热的兴起，与商品经济大发展与“经济利益至上”观念的影响有极大关系，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模式在信仰领域的延续，也即“宗教搭台，经济唱戏”。在此大背景下，民间信仰日益成为一种围绕“灵力”而进行的生产、经营与消费活动，即产生了一种“灵力经济”。在此，灵力是商品，民众求神活动是消费，围绕神灵的奉祀行为则是生产。另外，目前

的这种庙宇承包热潮也与当下的信仰大环境有一定关系，而这在民间信仰领域又体现得更为明显。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宗教传统”，20世纪初，在“民主”“科学”思潮影响下，民间信仰开始被冠之以“迷信”“愚昧”等各种称号。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民间信仰更是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压制。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大环境的逐渐宽松，民众的神灵信仰情结又被极大激发出来。但由于原有信仰场所等的大量拆除，于是不可避免出现了民间宗教“服务市场”与民众“信仰需求”之间的矛盾，从而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当下这种乱建庙宇及庙宇承包等现象的出现，并大大提升了现有“产品与服务”的价格。

作为传统神灵信仰与现代商业资本相结合的产物，对河北易县奶妈庙这种庙宇被承包及商品化现象，我们也需要从两个方面来加以认识。从“商品化”的角度来看，必须从“商品”的角度加强监管——虽然其并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商品。对此，我们要防止欺诈与谋取暴利现象的出现。如层出不穷的“天价香”现象，一些寺庙头柱香成交价高达99万元。另外，许多庙宇还存在欺诈骗象，如有的庙宇拿出功德簿让游客签名，并慷慨许诺由大师为你念经祈福消灾，结果签过名之后才告诉你不是白签的，是要捐功德钱的，少则几百元，多则成千上万元。你若不从，他们便不依，于是很多人只能哑巴吃黄连，被迫交钱了事。对于这些暴利及欺诈骗象，有关部门必须加强限制与监管。

从“神灵信仰”的角度来看，其实神灵信仰本身并没有错，且具有加强心理慰藉、缓解社会压力，增强地域社会整合等多方面的积极意义。因此，对于民间信仰，我们不应该只进行嘲笑与贬低，还应给予适当的尊重。当然，这有一个基本前提，即神灵信仰必须要在国家法制、法规的框架内展开进行，不能有任何危害国家、社会与人类的现象存在。另外，虽然民间信仰具有很强的“世俗性”面相，但作为神灵信仰，毕竟还有其“神圣性”的一面，而正是“神圣性”赋予了其多方面的魅力与功能。因此，神灵信仰又不能完全被当做“商品”来看待，因为“神圣性”消解了，“敬畏之心”也就不存在了，而这最终并不利于信仰的良性发展与社会秩序的有效建构。

(作者系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